

当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贵在行动

Options of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启 言

十多年来,我国社会日新月异,变化万千。去春以来,速度更是惊人。曾几何时,知识分子还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首批受益者,谁知似乎一夜之间,就被迅猛而来的社会商潮抛在了后边。生存危机、事业危机、精神危机愈演愈烈。于是,有人彷徨,有人愤然,有人无奈。

知识分子出路何在?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人们常说,改革是一场革命,革命必须付诸行动。

十多年前,安徽凤阳的农民为生存而自发地分田到户,农村改革从此滥觞。苏南农民不满足于“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幸福,办起了乡镇企业,其技术、人才、设备一开始与国有企业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此被有些人断定成不了气候。可如今,全国工业总产值40%出自乡镇企业,有的乡镇企业还跨出了国门,走向世界。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

农村改革是农民的创造,是农民的行动成果。

城镇个体户最初也是被逼上梁山,干起了被许多人歧视的小买卖。谁曾想到现在成了真正富裕起来的一个阶层。社会地位也日见上升。

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先行者。中关村一条街上的民办科技企业的开创者们,如今大都功成名就,物质生活丰裕不说,事业的成就感也溢于言表。

但是,相比之下,知识分子群体明显地落后。要求改善待遇的呼声虽连绵不断,却收效甚微;学术文化建设及其社会影响也不如前;政治参与的热情则处于一蹶不振的状态。面对这种局面,自艾自叹、悲观失望均于事无补。在这个信奉行动主义的时代,知识分子也必须行动起来,并且赋予行动以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含义。只有在行动的过程中,才有可能重塑自己的形象,才有可能找到一条自救与报国的道路。

在知识分子中间,“下海”恐怕是时下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和现在一般人关注“下海”的经济收益不同,最初的“下海”者与其说是为了高收入,不如

说是一种“对自由的选择”。传统体制内部人浮于事、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上下下的各种掣肘,促使那些胸怀大志,而又无处施展才能的科技人员愤然抛弃了铁饭碗,选择了一种既有风险,又富挑战性的新职业,从事开发、经营和贸易。民办科技企业的开创者们是其典型代表。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下海”者指的是那些跳出了传统体制,放弃了原有的教学、研究职业,从事技工贸活动的知识分子。而教授业余时间卖大饼,到校外搞点业余兼职,其实算不上真正的“下海”。显然,“下海”不但意味着要舍弃40年来“公家人”的某些优越感,而且要和几千年“君子不言利”的传统观念决裂。另外,经济独立还为人格独立奠定了基础,束缚人们手脚的依附人格及其心态也必然会逐渐消亡。这是“下海”之观念革命方面。其体制方面的意义在于,知识分子经营企业,往往没有国有企业的官本位取向和行政干预,能够有更大的自主权;知识分子和市场的结合使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找到了实现的主体和环境,同时在这种结合中一种新的基于理性的科学管理的方法也可能会随之出现;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事业心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更能避免某些暴发户的短视和金钱与丑恶现象沆瀣一气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可以肯定,知识型企业的体制优势、管理优势和长远考虑的优势的结合,必将使其成为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的中坚力量之一。乡镇企业这些年突飞猛进的发展引人注目,成绩斐然。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正视农民的局限性和狭隘性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和隐患。大邱庄的例子就足以引人长思。因此乡镇企业的知识化、理性化和目标长远化也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知识分子在商海里大有可为。

但是,认为除了“下海”知识分子别无出路也是片面的。我们不能在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之后反而放弃了一直属于知识分子的领地——文化建设。从长远看,知识分子一旦从学者变成了老板,就不再属于知识分子之列。知识阶层不应当从属于任何特殊的经济利益集团。一个健全社会的维系需经济、文化与政治的三足鼎立。

人所共知,中国文化正经历着自“五·四”以来最大的变动,古今中外各种思潮和流派几乎都已登场亮相,它们互相冲突又彼此融合。从学术文化层看,似乎并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且具有系统理论主张的派别。相反,商业文化借市场经济之势,正在渗透到社会各方面,并对学术文化构成威胁。比如,为了适应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精神需求,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古籍作品,但却是良莠不分,精华与糟粕共存,而相应的学术批判则远远不够。在热热闹闹背后,实质性的进展并没有多少。当然,学术文化贫困的原因并不只是商业化所致,以往政治意识形态的压制和灌输大大削弱了学术本应具有的创新精神和能力,面对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又怎能不捉襟见肘呢!知识分子内部文化取向的离散化和异质化则是学术文化衰微的另一原因。有些人钟情于对传统文化的精细描述,陶醉于对以往哲人的敬仰,在他们看来,回归传统是文化重建的根本所在。有些人则倾向于借助西方文化重整中国文化。还有些人主张中西文化结合。从学术角度看,这些看法本来都无可厚非,但要害在于,相当一部分研究,要么是书斋式的,要么是遵命式的,虽不能说与现实无关,但隔膜却是一目了然的。所以,我们迫切需要一种面向现实的文化行动。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分析,或是整体性的文化建构,现实都应当是其出发点。如果把文化建设比作一个三维坐标中的建筑,现实中国的状况就是坐标原点。离开了这一点,学术的方向和生命力遂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无头之鸟,无的放矢。进一步讲,以现实为出发点的理论研究,应该与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结合起来。在目前情形下,争论“姓资还是姓社”已无意义,关键是要将自己的主张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和方案,让实践来说话,来判断。

可以想象,在以现实为出发点重建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仍旧会有不同的主张存在,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些主张应当是学者们自己思考的产物,实事求是,以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是这些文化研究应当遵循的原则。在此基础上,需要研讨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比如,是以以道德和人伦为本的传统文化为主干,还是应当倡导以理性和法制为根本的现代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什么基础上,通过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彼此结合?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人的本质和权利,市场体制下私有财产的地位和作用,道德、理性和法律各自的位置和作用,民主、自由的本义及其在现代中国存在的形式,等等。可以预期,随着改革的深入,这些问题迟早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围绕着这些问题可能展开的争论和论战将会是旷日持久的,其结果将会使学术理论界的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也许若干年后,中国

会出现另一个鲁迅,另一个林语堂;会出现中国的罗素、卢卡奇、凯恩斯和马尔库塞。果真如此的话,知识分子将一扫过去依附与屈从的形象,而代之以独立和自尊,并重新获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行为与学术行为有本质的不同。生产经营追求利润最大化,学术研究则追求普遍性原理。我们提倡经济和文化的互动与互助,但却不主张两者的混合。就在真正的企业家还羽翼未丰,刚刚脱颖之际,“儒商”却频频见于报端,值得注意。众所周知,学术和政治不分贻害无穷,文商不分也弊大于利。企业家捐资学术理应欢迎,但不应当干涉学术;企业可以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但社会文化是更高层次、更具普遍意义的文化。后者是专业知识分子的职责,非企业文化所能替代。笔者认为,重申这一点是必要的。

今天知识分子对政治参与持一种冷淡与关切,激情昂扬与讳莫如深并存的矛盾心态。回顾 40 多年的历史,个中原因不难理解。然而,在我国,政治与经济和文化密不可分,息息相关,不能不使一切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关注政治。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变革;目前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样得益于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今后经济、文化的发展,离开了政治改革也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危险的。但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却存在着回避政治的倾向。“说了也白说”形象地表达了他们失望、淡漠和无可奈何的情绪。问题是,在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这首先是由于政府权威的下降留下了不少权力真空急待填补,在一定意义上,如果知识、科学和文明不去占领,金钱、迷信和盲从就可能趁虚而入。其次是因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不规则运作引发了诸如权钱交易、拜金主义、官员腐败、社会不公、道德滑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三则是由于法制和舆论监督滞后,无法对各种社会弊端进行有力的制裁和批判。毫无疑问,无论是对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还是针对性的批判、揭露、曝光,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可能进行的。具体说来,知识分子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作为。其一就是从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呼吁重视知识、教育与科技事业,加强投入,使其成为国家长远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其二,鉴于知识和科学在现代决策中的重大作用,知识分子应对政府政策和决策提出建议和批评,以树立一种知识权威,补政府权威的不足并防止其被滥用。其三,随着市场经济的演进,各种利益集团(地方的、部门的或单位的等)纷纷出现,对他们各自的利益要求,知识分子应当以科学的、独立的态度进行分析和评判。我们相信,不同利益和观点的相互制约和充分表达将有助于建立一种相对

合理、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避免各种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导致社会失控的发生。其四,就是要关心、探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知识分子政治参与最根本的一条。

平心而论,目前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条件与过去相比,好得多了。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政府方面改革开放的势头不减,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为各种政治创见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中国正越来越向国际惯例靠拢。换言之,世界的潮流与我国自身发展吻合之处日益增多。第二,开放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在中外比较中激进主义和情绪支配已逐步让位于渐进主义和理性。第三,改革开放使得个人、群体、阶层能够更直接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意愿,民主和多元的社会基础正在扩大。

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几年前的政治风波与经商热潮的交互作用极大地淡化和削弱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再加上言路不顺,不同意见还难以完全公开自由表达。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从长远

看,民主和法制终将成为中国的现实,但目前具体的操作和相应的理论与政策还很不成熟。由于多种可能以及这些可能的多种潜在组合,我们尚无法对中国的未来作出某种精确的预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深信,民主是人类最美好的愿望,也是社会长治久安、不断发展的保证,而民主的本质在于权力间的制衡。知识分子虽然并不具有道德上的任何优越性,但他们的职业特征和知识决定了他们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更强的参与能力,理应成为社会制衡结构中的一个不可替代的部分。渐进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并不意味着顺其自然,也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作用可有可无,相反,需要更多的理性、勇气和献身精神,需要更多的扎实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实际行动。这无疑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又一次考验。最后,我们期待一个在性格、能力和勇气上超乎以往的知识分子群体行动起来,为新体制的确立建功立业。(责任编辑 蔡德诚)

科技动态

日报分析今年气象异常原因

今年异常的夏季并不只是日本一个国家,中国下大雨,美国西部地区发生特大洪水灾害等,各地都出现了气象异常变化。有很多专家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发生异常气象,原因是偏西风呈蛇行移动,并出现了厄尔尼诺现象。但是,今年发生的异常变化,似不能仅用这两项原因作解释。

据日本气象厅长期预报课解释说,日本之所以阴雨连绵,是因为阴冷潮湿的鄂霍茨克海上空的高气压非常强烈,而另一方面,太平洋上空的高气压与之抗衡,其前锋容易在日本列岛的太平洋沿岸上空停滞不动,因而出现了类似梅雨那样的状况。加上台风不断发生,刺激了高压锋,增大了降雨量。

中国的大雨,似乎也是受前锋的影响。美国密苏里州等地发生洪水也是因为长时期降雨造成的。

关于这种大范围多雨的原因,预报官酒井重典说:“有其相同的原因,那就是偏西风呈巨大的蛇行移动。”北半球上空的偏西风,往年是以北极为中心基本呈球形移动,而今年夏季,它明显地呈蛇行移动。在到达亚洲附近的上空后,分为两股气流,一直呈现出将来自交方的冷空气带入日本上空的状态。

美国除上述地区发生洪水之外,从春季到夏季,天气也发生了巨大的异常变化。据美国海洋大气局气候数据中心调查,4月至7月的降水量,在受荷华州塞达拉皮兹达到平年的2.2倍。相反,在东

南地区却发生了干旱。

气温的情况也极异常。在东部的华盛顿,7月曾出现热浪,最高气温达到40℃,月平均气温达到38.4℃,这是自187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但是,西海岸的北部地区却出现了令人头痛的冷夏,7月份平均气温只有14.9℃。

关于天气异常的原因,美国海洋大气局气候分析中心特别研究员埃特也谈到了是因为通过北美大陆的偏西风呈蛇行移动。而关于蛇行移动的原因,是因为大西洋上空的高气压比往年要强。此外,据认为还有海面气温和地上气温等与之相关的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全球范围来说,今年的异常变化是继去年接连发生的。据世界气象组织《1992年年报》记载,发生洪水、冷夏等显著异常现象的地区有21个。

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又重新发生,去年夏季曾一度消失之后又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使太平洋东部的水温增高,水蒸气上升就形成多云。但是,这次太平洋东部海域上空云层并不多。相反,据说菲律宾附近海面水温升高,并且上空多云。通常发生厄尔尼诺现象时,并不是这样。此次发生的异常变化,应该是有若干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

(原载《世界科技译报》1993年9月1日科文译自日《朝日新闻》)。